

宁

夏

文

史

● NING XIA HUI ZU ZI ZHI QU
WEN SHI YAN JIU GUAN BIAN

●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文史研究馆编

● 第十六辑



宁夏文史

第十六辑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

二〇〇〇年七月

封面题字:刘正谦

封面设计:胡正伟

宁 夏 文 史

第十六辑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168千

印数:1000册 2000年7月印刷

承 印:宁夏弘扬印业有限公司

准印证:宁新出管字〔2000〕第381号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2000年1月28日，自治区政府在宁夏宾馆礼堂召开聘任文史馆员仪式。图为聘任仪式会场。



1999年9月8日，我馆在宁夏宾馆接待厅召开纪念宁夏解放50周年座谈会。图为座谈会场面。



1999年8月25日至28日,《福建·宁夏文史研究馆书画联展》在银川市举行。图为开幕式场面。



1999年11月3日至6日,《宁夏·福建文史研究馆书画联展》在福州市举行。图为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省委副书记石兆彬,省委常委、秘书长黄瑞林,副省长朱亚衍等参观展览。

《宁夏文史》编辑委员会

顾 问：徐梦麟 孙鸿书 刘正谦

主 任：(暂缺)

副主任：梁 海 (常务) 胡正伟 胡迅雷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马小平 牛达生

叶光彩 杜桂林 何其正 张照寰

张鸿才 陈永中 胡正伟 胡迅雷

梁 海 谢 东 韩 东 窦连荣

总 编：胡迅雷

编 辑：韩 东 牛达生 张鸿才 杜桂林

陈永中

目 录

西夏研究

藏文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应用 牛达生(1)

党项三都

——兼述党项政权的西迁 杨 蕤(29)

史志论丛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思想道德观

对宁夏地区的影响 窦连荣(47)

燕然山与燕然州 苏忠深(57)

明代宁夏马贡

——宁夏土贡考述之三 陈永中(61)

香山牧马碑及其文献价值 叶光彩(70)

试论海固回民起义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 梁永恒(80)

文史纵横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史述略 张鸿才(94)

回族英雄马文良遇难经过 张树林(113)

解放前的中宁测候所 杨应林(118)

民国时期西吉县长孙宗濂被控

贪污违法案始末 胡迅雷(121)

马仲英打宁夏及其前前后后(上) ... 张照寰(129)

宗教寺院

宁夏清真寺的历史与现状综述(一)

..... 吴建伟(152)

丝绸之路与宁夏石窟艺术 韩有成(162)

中卫县高庙保安寺 何其正(176)

宁夏漫谈

漫谈宁夏牡丹 黄多荣(181)

话说银川鼓楼门匾题字 杜桂林(196)

马鸿逵父子与宁夏秦腔 井笑泉(199)

岩画研究

贺兰山岩画简介 (202)

贺兰山岩画的太阳图腾崇拜 李祥石(203)

奇石欣赏

宁夏奇石 陈 西(221)

话说戈壁石 朱爱朝(231)

诗词园地

贺兰砚赋 卢 斌(242)

词二首 贾朴堂(246)

银川行 赵玉林(247)

塞上行 任仲泉(251)

馆员之页

历经沧桑 矢志不渝

——记贾朴堂先生 王预先(253)

宁夏文史研究馆大事记(1996.3—2000.7)

..... 胡迅雷(263)

藏文文献在西夏学 研究中的应用

牛达生

内容提要:由于西夏与藏族的特殊关系,在藏文文献中也保留了许多有关西夏的资料。但由于藏文文献的不易见到和藏文文字的障碍,在80年代以前,藏文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应用还十分有限。80年代以来,随着藏学的发展和汉译藏文史籍的不断出版,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发表了一些相当有份量的文章,涉及到党项族的起源、西夏的建国及其灭亡、西夏的遗民等问题,从而为西夏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本文对藏文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应用,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介绍了著名藏学家黄颢、陈庆英等一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回顾过去,在西夏学的研究中,曾经应用过多种文字的文献。当然,首先是汉文文献的应用,明代《弘治宁

夏新志·拓跋夏考证》，是最早的西夏编年史，也是最早综合利用宋元汉文文献的成果。本世纪以来，随着西夏文文献特别是黑城大量西夏文文献的发现，不仅对这些文献的整理、译释、考证和研究成为西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研究成果又被广泛应用到西夏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从而大大促进了西夏学的发展^①。由于西夏和藏族的特殊关系，在藏文文献中也保留了许多有关西夏的资料。80年代以来，随着藏学的发展，汉译藏文史著也不断出版，其中诸如《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青史》、《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等^②，大都有关于木雅(弭药、西夏)的内容，从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将其引入西夏学的研究。

其实，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夏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学者们就注意对藏文文献的应用。1943年，韩儒林先生在《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一文中，就注意到藏文本《福幢帝系明鉴》关于“赵宋失国于 mi -- nag(木雅)”的记载，并正确的指出 mi -- nag 非金，认为这是西藏史学家“误女真为 mi -- nag 者矣”^③。1962年，王忠先生在《西夏的兴起》一文中，就直接用原版藏文《智者宴》(即《贤者喜宴》)的有关记载，说明“西夏除了主要提倡汉文化，也提倡吐蕃文化”^④。但是，由于藏文文献的不易见到和藏文文字上的障碍，藏文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应用还十分有限。

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其后期,利用藏文文献研究西夏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首先是黄颢先生。80年代前期,在汉译藏文史著基本尚未出版的情况下,黄先生一方面积极进行藏文史籍的汉译,发表了《智者喜宴》译文,出版了《新红史》;同时,充分利用藏文原始文献进行西夏研究,并将其成果反映在《新红史》第232、233、234等条注释,及《藏文史书中的弭药(西夏)》一文中^⑤。注释及文章(下称黄文),首先对《红史》等七八种载有西夏史的藏文史籍作了介绍,并依据它们,对西夏的称谓、西夏的兴起及其历史、西夏与西藏的文化关系、吐蕃对西夏宗教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是利用藏文资料研究西夏的突破。这些论著的发表,引起也是刚刚起步的西夏学学者的重视,在其后发表的有关西夏学论著中,多有议及木雅内迁前和吐蕃的关系,以及西夏建立后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藏传佛教在西夏传播的情况等,其中使用的资料,或多源于黄文。降及90年代,随着更多的汉译藏文史籍的出版,学者们特别是陈庆英等部分藏学家,逐渐认识到这些文献在西夏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并发表了一些很有份量的文章,对诸如党项族的起源、西夏的建立及其灭亡、西夏的遗民问题等,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从而为西夏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本文拟对这些成果作一论述,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关于党项族的族源问题

关于党项族的族源问题,早在五六十年就有所争论,是西夏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一种意见认为党项族是古代羌族的一部分,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政权^⑥;一种意见认为西夏虽然以党项族为主,但西夏的皇族却属于鲜卑族拓跋部^⑦。争论的焦点是西夏皇族的族系问题,即西夏皇族拓跋氏是党项羌还是鲜卑族系。这种争论,双方各有所据,谁也难以服谁,似有越演越烈之势,怕是近期难有结果。

党项与吐蕃(藏族),在血缘上和文化上有密切的关系,这是西夏学界普遍承认的事实。但是,藏学界早在50年代就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党项族是“属于藏族系统的一族”,西夏是吐蕃在西北建立的一个王朝^⑧,却未能引起西夏学界足够的重视。90年代以来,多篇重要论文的发表,使这一观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态势,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部分学者认为党项是“安多”^⑨藏族的一支:如有的认为,党项羌在汉晋时代“在(青海)果洛地区活动”,是在“吐蕃大举东进的过程中汇入吐蕃族,并在之后成为藏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成员”,“现代果洛藏族的大部分乃党项羌之后裔”^⑩;有的认为,党项之“拓跋”是藏语之译音,为青海“果洛地区的部落和地名之一,与鲜卑

之拓跋氏无关。”指出“仅仅以卫藏地区的古代部族为(藏族)土著,而把其他地区从古代以来说藏语的诸部族,只作为与藏族有关的部分,而不视作土著,似与历史事实不符”^①。黄文也认为党项羌“曾与古代吐蕃先民融合,成为吐蕃民族的一个重要部分。”

部分学者干脆认为党项族是吐蕃先民塞(色)、穆、董(党)、东(敦、冬)四姓中董氏的一支:如有的认为“党项”是藏语的音译,是“董氏之族裔”之意,藏语称党项为“党项弥药”,是从西夏的族姓来称呼的^②。有的对“党项”、“弥药(木雅)”以及拓跋氏、房当氏等党项八部名称的语源进行了考辨,大部分名称在藏语中找到了对应的词汇,认为‘党’字源于‘董’字音译,“项”字“来自藏语表示下部的字”;“党项”意为“下部董氏”,得出“木雅人无疑是董族中最为重要的一支”的重要认识^③。

陈庆英先生《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一文^④,利用汉文文献特别是藏文史籍,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论述了西夏与藏族的关系,对党项族的族源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进一步确认党项是吐蕃董氏的一个分支。其主要根据是:

第一,在历史文献中,无论是汉文、西夏文、还是藏文资料,都记载“西夏属于弥药氏”。“弥药不仅是吐蕃对党项的称呼,而且也是党项人前后一贯的自称。”许多藏文古籍诸如《汉藏史集》、《拉达克王统记》、《果洛宗

谱》等,不仅记载藏族先民四大姓氏中有“董”姓,有的文献中还有“董弥药”、“弥药董”的称呼,这说明“一些藏文史籍认为弥药(木雅)是藏族先民四大姓氏中董氏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认为弥药应当是藏族的一部分。”另外,从党项族的居住地分析,“《汉藏史集》说,弥药是董氏在下部的一个分支,也即是说弥药是在藏族地区的东部;《果洛宗谱》说,董氏在乌思藏、康区、安多都有分布;在康区的董氏有《格萨尔王传》中的岭国,在安多的董氏分布在玛沁雪山一带果洛地区,这与党项羌的分布地区也正相符合”。也就是说党项族的分布不仅限于安多,而是在藏地各区。

许多论著已经谈到吐蕃赞普松赞干布(617-650)娶了弥药如容纪杰莫尊,以此来说明党项与吐蕃关系的久远,这是因为“如容氏是弥药的一个分支”。另有资料说,松赞干布之后第六世牟尼赞普(797-798在位)的妃子为如容萨朵甲,也是弥药人。尤为重要的是,根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第吴宗教源流》等记载,“松赞干布的六世祖墀脱赞的王妃为如容萨东甲措玛;她生子拉托托日年赞”^⑤,说明早在6世纪,也即“松赞干布之前100多年,吐蕃王室就与党项有过联姻关系”。只是到了9世纪,在“吐蕃王朝崩溃后,北迁银、夏的党项部落,走上了与其他藏族地区各部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党项平夏部为基础,在北宋时期建立

起西夏王朝”。

第二,西夏文化与吐蕃文化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这是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陈文通过对西夏语、西夏称谓、西夏习俗与藏语、藏族称谓、藏族习俗的对比研究,得出夏藏关系不是一般的“亲缘关系”,“颇为相近”,而是夏藏称谓相同,习俗相同,“党项羌在北迁以前使用的就是藏语”的重要结论,进一步证明了党项羌就是吐蕃的一部分。

陈文首先从夏汉双语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挑选了“最基本的最不易变化的”诸如头、目、心、肺等 58 个名称,与藏语行了对比研究。结果是除少数几个词为汉语借词和尚难确定其词源外,其中 41 个证明与藏语同源。而这些词在敦煌出土的吐蕃王朝时代写成的藏文医学文献中多数都已出现,都非藏语借用词汇,证明是“是藏文中早就具有的词汇”。《文海》是以声、韵归类的西夏文辞书,对每一个字的形、音、义都有详细的注释,是研究西夏文字、语言最重要的文献。陈文认为夏藏两种文字同义的词,其韵也应是相同的,并对该书平声第一韵 u 或 iu 韵所收的 60 个字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除 9 个为同韵的汉语借词和无法找出藏文的对应词外,在“剩下的 51 个字中,有 46 个按照释义找出的藏文对应词都为 u 韵,占 90%。”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西夏语与藏语在音韵上的一致性,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而是由西夏语是源于藏语的安多方言所决定的”。

作者对西夏语与藏语在词汇、构词法和句法上的若干差异作了探讨,认为这是党项羌“在北迁以后受周围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影响”而产生的。“西夏语是藏语的安多方言在接受大量汉语借词的基础上形成的。”类似今天甘青一带汉藏杂居区藏人使用的“嘉玛窝(意为半藏半汉)”,“从根本上说它还是应属于一种藏语的特殊方言”。作者还对西夏所以不使用现成的藏文而另创新字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不仅是受汉字的影响,还可能受契丹字的影响,但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李元昊建国称帝是以“与宋、辽鼎立的君主自居的,自然不愿提起党项是与吐番有亲缘关系的西羌的一支的事实,因此在创制文字时自然倾向于在藏文之外采用汉字偏旁另制”。

陈文对夏藏称谓和习俗的异同进行了对比研究,他认为西夏实行族外婚制,党项人盛行收继婚制,“这与藏族牧民的习俗相同”。党项人衣皮毛,事畜牧,住牛毛帐房,吃肉类和奶制品等,“也与藏族牧区相似”。西夏人的亲属称谓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藏族复杂,但主要部分如祖父、曾祖父、父亲、母亲、父辈、姑姑、舅舅、公公、岳父、亲家翁、亲家母、兄弟、姐妹等,都在藏文中找到了它的相应词。

第三,党项羌人的宗教信仰与藏族相似。佛教未传